

目录

总序	张 剑	ix
前言	张海榕	xviii

第一章 解辖域化概说 1

1.1 解辖域化话题缘起	1
1.2 解辖域化界说	17
1.2.1 解辖域化三阶段：“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17
1.2.2 解辖域化类型	22
1.2.3 解辖域化定律	29
1.2.4 解辖域化路线：克分子线—分子线—逃逸线	34
1.3 解辖域化的研究意义	39
1.3.1 理论意义	39
1.3.2 社会意义	50
1.3.3 文学意义	53

第二章 解辖域化的关键概念 57

2.1 解辖域化的哲学基石	61
2.1.1 生成	61
2.1.2 无器官身体	66
2.1.3 根茎	71
2.1.4 游牧	76

2.2	解辖域化的政治学意蕴	78
2.2.1	捕获装置	78
2.2.2	欲望机器	83
2.2.3	国家装置与战争机器	86
2.2.4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分析	89
2.3	解辖域化的文学内涵	93
2.3.1	褶皱	93
2.3.2	小文学	97
2.3.3	符号与文学机器	100
2.3.4	地理哲学	104

第三章 解辖域化经典案例解读 108

3.1	论亨利·詹姆斯《在笼中》中的解辖域化路线	108
3.1.1	“僵化的线”：生活的节段化装置	109
3.1.2	“柔顺的线”：分子性的欲望与秘密	111
3.1.3	“抽象的线”：逃逸的形式与不可感知的生成	113
3.2	论菲茨杰拉德《崩溃》中的解辖域化路线	115
3.2.1	“僵化的线”：“生活的瓦解”与节段化结构	116
3.2.2	“柔顺的线”：分子的崩溃与生成政治的萌芽	119
3.2.3	“断裂的线”：绝对解辖域化与边界的终结	122

第四章 解辖域化原创案例分析 127

4.1	论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的解辖域化	127
4.1.1	平滑空间：西部暴力	128
4.1.2	逃逸线：血腥仪式	132

4.1.3	解辖域化：战争反思	136
4.2	论拉尔夫·埃里森《看不见的人》中的解辖域化城市景观 ...	139
4.2.1	空间的蛰伏与规训：“辖域化”的城市旧建筑	140
4.2.2	空间的觉醒与逃离：“解辖域化”的城市新景观 ...	145
4.2.3	空间的融通与异化：“再辖域化”地下城市景观 ...	150
4.3	论辛克莱·刘易斯《王孙梦》中的解辖域化身份叙事	153
4.3.1	“权力运行机制”下的白人身份叙事	155
4.3.2	“镜像指涉”中的黑人身份叙事	156
4.3.3	“再辖域化”中的双重身份叙事	159
4.4	论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中的解辖域化特征 ...	162
4.4.1	“空间的根茎”：萨德本百里地	163
4.4.2	“语言的褶子”：“旋转式”的叙述者	167
4.4.3	“游牧”：“穷人发迹”对于南方观念的“瓦解”	171
第五章 解辖域化的概念反思与研究展望		176
<hr/>		
5.1	解辖域化的概念反思	176
5.2	解辖域化的理论展望	182
结语		189
<hr/>		
鸣谢		191
参考文献		193
推荐文献		201
索引		203

前言

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潮流涌动，巨星云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是其中最为特殊且璀璨的一位。在2007年发表的《小万神殿》(*Petit panthéon portatif*)中，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遴选出14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并用一种“绝对真实”的方式“唤醒”他们的思想。他从拉康出发，走过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阿尔都塞，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德勒兹、福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博雷耶(Jean Borreil)对话，最后抵达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吉尔·夏特雷(Gilles Châtelet)、弗朗西瓦·普鲁斯特(Françoise Proust)。对于巴迪欧而言，这绝不是一种对历史尘埃的悼念，而是一次对于思想先贤的朝圣，不亚于一场伟大的“神迹”。这部作品中谈到德勒兹的部分是一篇名为“德勒兹逝世十周年”的献词，巴迪欧如是开场：“为何在十多年之后，他仍然是我们的同代人？他又是如何与其时代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是极为稀少的，是为了在未来成为同代人。”(巴迪欧：91)在此，巴迪欧用两个“令人颇感意外”的问句，反而“合乎情理”地道出了德勒兹的重要价值与独特风格：通过批判继承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真理观，

修正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的文本分析, 抨击拉康的精神分析, 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 支持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 的情动身体, 德勒兹逐步建构起具有深刻“终结”思想与“断裂性”特质的哲学理路, 进而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未来哲学家”(92)。当然, 也正是这种“特殊性”让德勒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思想界“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博学如巴迪欧也不免谨慎地告诫道, “将德勒兹置于普通的谱系中极为困难”(91-92), 他既不属于后现代主义者, 也不是后结构主义阵营的一员。在此背景之下, 巴迪欧自然而然地喊出了每一位德勒兹研究者的心声: “那么, 在我们的时代, 我们应如何召唤他呢?” (93)

关于这个问题, 或许德勒兹传记作家芙丽达·贝克曼 (Frida Beckman) 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贝克曼决定为德勒兹立书作传之时, 弗朗索瓦·多斯 (François Dosse) 刚刚完成了一本《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 交错人生》(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在这本厚达650页的巨制之中, 多斯沿袭传统的编年体形式对德勒兹的生平进行了详尽描述。然而, 这一做法却遭到贝克曼的强烈反对, 她指出, “对德勒兹而言, 聚焦于人物生平并以编年史的方式将其记录, 这份记录不仅定义了还不可避免地限定了它所表达的一切, 这有悖于德勒兹对于作者生平的看法, 也有悖于他整体的哲学思考”(贝克曼: 3)。她的意思是,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德勒兹传记不仅在于记录他的生命历程, 更应成为其哲学理念的具象化实践。唯有如此, 这部作品才能抵达与德勒兹哲学精神共振的理想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 雄心勃勃的贝克曼把视野聚焦到《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以下简称《千高原》)的“根茎式”叙述形式。她将传记一分为五¹, 旨在从德勒兹最重要的生命经历切入、生成与

1 贝克曼将所写传记记分为五章, 分别是“一个孩童”(“A Child”)、“一种生命”(“A Life”)、“一名学徒”(“An Apprenticeship”)、“一段友谊”(“A Friendship”)、“一次实践”(“A Practice”)。

展开，借助章节内部无限的包容性以及章节之间明显的断裂性制造遐想空间，最终实现对德勒兹生命轨迹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贝克曼的实践启示我们：理解伟大哲学家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思想精髓，而“解辖域化”正是德勒兹哲学体系的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德勒兹的相关研究在近30年内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学三个方面佳作频出，这无疑为我们把握德勒兹思想提供了重要路径。就哲学主题而言，相关的作品有《德勒兹与哲学剧场》（*Gilles Deleuze and the Theater of Philosophy: Critical Essays*）、《萌芽的生命：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Germinal Life: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Deleuze*）、《德勒兹与地理哲学：指南与词汇表》（*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 A Guide and Glossary*）、《德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褶子》等；至于政治学主题，有《德勒兹与政治》（*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德勒兹、马克思与政治》（*Deleuze, Marx and Politics*）、《吉尔·德勒兹：强度的还原》（*Gilles Deleuze: The Intensive Reduction*）、《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Deleuzian Concepts: Philosophy, Colonization, Politics*）、《欲望·游牧·政治：吉尔·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等；再及文学主题，有《德勒兹与文学》（*Deleuze and Literature*）、《德勒兹与宗教》（*Deleuze and Religion*）、《德勒兹论文学》（*Deleuze on Literature*）、《审美经验与身体意象：思索德勒兹美学的一个视角》、《德勒兹与当代艺术》（*Deleuze and Contemporary Art*）、《〈意义的逻辑〉与卡罗尔的胡话文学》等。应该说，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视角切入德勒兹的关键概念，却在理论脉络上形成共振。究其原因，盖有二。一是研究视角的“解辖域化”趋势。上述研究对于德勒兹理论的阐释既没有将自己框定在哲学的逻辑范畴之中，也没有因为锚定政治学主题就局限于政治领域，更不会因为聚焦文学作品就止步于艺术维度；相反，关于德勒兹的阐释往往是各个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呈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二是理论本身的“解辖域化”属性。作为概念

创造的大师，德勒兹在多个学科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在哲学领域提出了“根茎”（rhizome）、“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游牧”（nomad）等概念，在政治学维度建构了“欲望机器”（desire machine）、“捕获装置”（apparatus of capture）、“战争机器”（the war machine）等理论，在文学领域创造了“褶皱”（fold）、“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地理哲学”（geo-philosophy）等范式。然而，这些看似分散的关键概念彼此共享着“差异性”“流动性”和“多元性”的逻辑底色，最终依据不同的文本语境重新指回解辖域化的思想原点。由此看来，解辖域化已经成为当代德勒兹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这也是促成本书诞生的最大原因。

本书以“解辖域化”为核心研究对象，共分为五个章节展开探讨。第一章为概说，简要介绍话题缘起，梳理解辖域化的不同阶段、类型、定律以及路线，并揭示该话题的研究意义。第二章阐述关键概念，从哲学、政治学、文学三重维度系统提炼出解辖域化理论的关键概念群，筑成跨学科对话的话语基石。第三章为经典案例解读，援引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中反复提及的两部作品，即《在笼中》（*In the Cage*）与《崩溃》（*The Crack-Up*），对其解辖域化观点、思路以及论证过程进行细致的介绍与剖析。第四章为原创案例分析，选取《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王孙梦》（*Kingsblood Royal*）、《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等四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文学作品，从解辖域化视角展开分析，以此展示该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应用路径。第五章为解辖域化的发展趋势与展望，总结当前解辖域化的热点议题，进而探讨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比如解辖域化与赛博空间（cyberspace）、解辖域化与文化地理学、解辖域化与马克思主义、解辖域化与AI，等等。

正如法国另一位哲学大师福柯所预言，“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德勒兹，2020：118）。当德勒兹创设的概念被愈发广

泛地引用，甚至成为流行的批评话语时，我们愈发真切地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福柯所预言的“德勒兹的世纪”或许已经到来。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妨在此大胆地续上一笔：倘若“德勒兹的世纪”终将来临，那么“解辖域化”无疑将是其哲学皇冠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张海榕

河海大学

2025年12月1日

解辖域化概说

1.1 解辖域化话题缘起

Deterritorialization一词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心理学家瓜塔利创设的一个哲学概念，译为“解辖域化”，又译“解疆域化”。目前，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笔下存在不同的译法，例如，日本学者筱原资明译作“脱领土化运动”，栾栋指向“脱领土化”，夏光解释为“非地域化”，黄文前称之为“去疆域化”，而包括张在新、程党根和余岱宗在内的更多学者则将其理解为“解辖域化”。那么，解辖域化的概念有何理论渊源？

其一，解辖域化源自拉康的“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概念。1972年，瓜塔利在其著作《精神分析与横向沟通》（*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 Essais d'analyse institutionnelle*）中首次使用了“辖域化”这一精神分析术语，引用自他大名鼎鼎的导师——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在过程分析理论中，拉康率先创设并使用辖域化这一概念描述儿童性敏感区的成熟过程，指向母亲在哺乳过程中，力比多在乳房与嘴唇之间流淌的现象，借此辖域化指向使主体受到编码（coding）的过程，而解辖域化则指向主体从既定的符码中抽离、逃离的过程（康有金：50）。1972年，德勒兹和瓜塔利在其合著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以下简称《反俄狄浦斯》）中进

一步将概念具体化，此时，解辖域化可以使因辖域化而被束缚的性刺激从母体中解脱出来并移情别恋。此后，德勒兹与瓜塔利将解辖域化概念延伸到社会学范畴——把物质层面的生产和精神层面的欲望从社会压抑与规训的编码中解放出来的现象，称之为“解码”（decoding），并由此创作出《千高原》。在这部作品中，两人通过对社会“解码”的方式，使欲望打破心理辖域的框定。因此，解辖域化被视作个人和团体摆脱压抑性社会规则的控制、创造新的生活和存在模式的必由之路，并把资本主义看作解辖域化的范例（张志斌：359）。在《千高原》一书中，他们用457次的高频率¹提及解辖域化，将其视作“离开辖域的运动”²（Deleuze & Guattari, 1987: 508）、一种穿越辖域化的力量，用来批判辖域化的资本主义；他们还将解辖域化作为精神分裂分析的重要支柱，在不同章节中分别阐释“解辖域化”与“根茎”（第一章）、“无器官身体”（第六章）、“抽象机器”和“构图”（第五章）、“面貌”（第七章）以及“生成”（第十章）之间的关系。同时，解辖域化与辖域化、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等概念一脉相承，成为德勒兹和瓜塔利审视世界的差异哲学与流变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

其二，解辖域化这个非历史性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尤金·霍兰德（Eugene W. Holland）将马克思视作德勒兹与瓜塔利写出两卷《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三大批评成因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康德 [Immanuel Kant] 和弗洛伊德），他认为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均可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理论根源（霍兰德：14–20）。譬如，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具有自身要求重复劳动生产的特征，通过非差异性的重复劳动，加之商品交换的过程，最终返回到稳定的、绝对的、体制的状态

1 该统计基于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千高原》英译本，其中deterritorialization使用338次，该词屈折变化deterritorialized使用100次，deterriatorializing使用19次，共457次。（参见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2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不再特别说明。

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压抑欲望的，缺乏改变的。如果将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概念引入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发现隐藏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的哲学轮廓。第一个时刻，当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为了提高生产力与生产效率，对现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主体进行改造，从而产生解辖域化运动，但这一运动的有效性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运转模式，只涉及表层范围内“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促进新型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出现。第二个时刻，当创新化的资本生产过程被阻塞，进步的解辖域化力量突然停步不前，一切逸散的、活跃的要素都面临再辖域化的结果：改革中的生产和消费机器受到现已陈旧的资本储备的束缚，其唯一目的就是要发挥旧的资本储备的价值，获取以前的投资的利润。换言之，当资本主义破坏它的界域时，它的自身性质仍未改变，解辖域化的目的是进行更为强大的再辖域化，收集释放出来的剩余价值与能量，同时将生产关系投射到全宇宙的界域当中，将生产关系覆盖到更多的群体。解辖域化的浪潮解放了生产和消费中的全部创造力，同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得到革新和社会化；反过来，再辖域化对生产—消费关系重新界定，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攫取（147-148）。

德勒兹和瓜塔利对解辖域化概念的丰富具有阶段性。

首先，解辖域化的初步构想：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他们认为解辖域化过程并非指向承诺过的或预先存在的领地，而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创造出来的一个即将来临的未知世界，在解辖域化过程中，逃逸的人不断产生其他的逃逸并标志出一个新世界，这一新世界不仅仅是个希望，而是“最终的设计”（*finished design*）（Deleuze & Guattari, 1983: 322）。

其次，解辖域化的文学内涵：在《卡夫卡：走向小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一书中，他们认为解辖域化是指将一个可能性或事件从它的现实起源处解放出来，解辖域化产生“纯粹感受的影像，它是一种不指定任何特定身体或空间的感觉”（科勒布鲁克：73）。

再者，解辖域化的地理路径：在《千高原》一书中，他们认为解辖域化是人或物离开辖域化的运动，可能被再辖域化遮蔽，逃逸线由此被阻断，变成否定性的解辖域化，也可能再辖域化使逃逸线被分解成先后接续的进程，从而使解辖域化变成肯定的或相对的（Deleuze & Guattari, 1987: 731）。

最后，解辖域化的哲学内涵：在德勒兹和瓜塔利合著的《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一书中，他们将解辖域化概念进一步从哲学层面应用于地理学、科学逻辑与艺术等领域，提出概念上的解辖域化是要把思维的领土界限及其绝对地脱离领土、重建领土的活动显示出来，因此解辖域化的范畴既可以是地理位置的变化，也可以是精神维度上的变化，进一步丰富了解辖域化的研究价值。

更进一步，解辖域化概念脱胎于德勒兹与瓜塔利毕生的哲学成长路径。

德勒兹是一位影响世界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的父亲是一位保守的右翼工程师，名叫路易·德勒兹（Louis Deleuze）；其母奥黛特·加玛穆尔（Odette Camaüer）则是一名家庭主妇（贝克曼：10），但也有一定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德勒兹说，他母亲无法和工人阶级共享诺曼底海滩（10）；其兄长乔治·德勒兹（George Deleuz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时为德军所俘，在前往集中营的路上不幸逝世。1956年，德勒兹与丹妮·保罗·格朗卓安（Denise Paul Grandjouan）结婚，厮守终生，生育两个子女——朱利安（Julien）和艾米丽（Émilie）。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贝克曼承袭德勒兹“用一个名称来表示贯穿个体的力度与多样性”的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哲学思想（6），用五个阶段概括德勒兹的一生。其中，两个阶段概括了德勒兹的生平。“一个孩童”（“A Child”）——“通过写作成为一个孩童”，是德勒兹思考得出的文学创作的任务。纯粹、积极、脆弱、不稳定的孩童遍布于德勒兹的写作中，且德勒兹在早期哲学研习中也体现出睿智、自信与无畏、具有重塑哲学思考雄心

的少年心气。“一种生命”(“A Life”)——德勒兹强调生命的非人格本质,认为生命无所不在,它存在于一个实际的、活生生的主体所经历的所有时刻之内,并且,这些时刻都要经由确定的、存在过的客体见证与记录。一种内在的生命,它自身就具有特异性,并负载着诸多的事件,而该种特异性与这些事件唯独在诸多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之中才能被实际化(112)。

德勒兹的著作历程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一名学徒”(“An Apprenticeship”)——差异与重复对于德勒兹的本体论概念至关重要。德勒兹认为差异并不依赖同一性(identity)与对立性(contradiction),它形成了一种坚决的抵抗,抵制将同一性置于至高无上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同一性不仅排斥否定性,还将差异隶属于其下,简化化为只要综合就能断定的结果(贝克曼:27)。“一段友谊”(“A Friendship”)——友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德勒兹的著作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友谊关乎的不仅是教学法(pedagogy),此外,它还关乎思考、遭际、滑稽可笑的事物、非人之物、对话性、爱与距离、愉悦与实验。德勒兹与福柯、利奥塔、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等结下了友谊,尤其与瓜塔利的友谊最为耀眼(44)。“一次实践”(“A Practice”)——德勒兹追求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哲学,由此,他在艺术、电影、文学和音乐上的见识与经历便组成了这种哲学思想的不同实践方式。

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体系庞杂且影响深远。德勒兹近70年的人生轨迹,给当代哲学和美学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涉及诸多学科,譬如文学、胚胎学、动物行为学、数学、物理、人类学、语言学、冶金学¹等。后现代

1 帕特丽夏·品斯特(Patricia Pisters)认为,“在德勒兹和瓜塔利《千高原》的游牧学一章中专门引入了冶金概念,揭示了四分五裂的国家政治和少数民族游牧政治的差异”(品斯特等:40)。事实上,“冶金”在《千高原》中不仅仅作为解释游牧学的哲学概念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学科被详细阐释。“冶金学自身构成了一股必然与游牧运动汇合的流”,德勒兹与瓜塔利提出冶金学被称为“科学”的核心在于“流变”:陨星和天然金属之间的流变、矿物与金属成分之间的流变,天然或非天然合金之间的流变,等等;并指出,“流变”的冶金学通过金银细工、珠宝工艺等符号书写在游牧民的生产、发展与文化艺术之中,并通过工具、武器表达出“一种特异性的集合体”,换言之,组成了“共同的逃逸线”,形成了劳动与自由运动之间、游击战与正规军战之间的一种创新与多变的斗争(德勒兹、瓜塔利,2023:375-380)。

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将德勒兹视为现代哲学天才，认为德勒兹与瓜塔利共同的哲学思考具有丰富和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意义。学术界称德勒兹为“思想的下沉者”（于奇智：72）。福柯这样评价德勒兹：“闪现一道光，这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思想又重新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转引自德勒兹，2020：118）德勒兹在访谈录中回应道：

我不知道福柯这句话的意思。我从未问过他。他有奇怪的幽默。也许他想说，我是当今哲学家中最天真的哲学家。在我们所有人的著作中，人们都看到了诸多多样性、差异、重复这些主题。当人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时，我却提出了一些近乎原始的概念。我从不曾被形而上的超越或哲学的死亡所触动。而对于整体、一、主体的舍弃，我也从未看得那么严重。我并未与那种直接或间接展现概念的经验主义绝断。我没有经由结构、语言学、精神分析、科学乃至历史，因为我认为哲学有其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使之进入外界关系之中，进入尤为必要的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之中。福柯可能想说，我不是最优秀的，却是最天真的，或可说我类似一种原始艺术，不是最深刻的，却是最清白的（最没有“搞哲学”的罪恶感）。（德勒兹，2020：119）

德勒兹艰深的哲学论述，是其哲学学术生涯的折射。回顾德勒兹的学术生涯，他毕生沿着学习哲学—教授哲学—研究哲学的轨迹前行。

其一，学习哲学。德勒兹的少年时期正值战争与纳粹集中营事件阴云笼罩，法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启蒙了德勒兹基本的政治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德国入侵法国前夕，德勒兹与其兄长一同进入卡诺国立中学读书。依托老师指导，中学时期的德勒兹接触到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和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等法国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其文学和哲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战争期间,德勒兹回到巴黎,在卡诺大学预科就读。

其二,教授哲学。1944—1948年,德勒兹在索邦大学研习哲学,并于1948年顺利通过高中教师招聘会考,获得执教资格。此后,他辗转于多所中学教授哲学,陆续在阿米杨、奥尔良与巴黎等地的高中任教。1957—1960年,德勒兹回到索邦大学担任哲学系助教,讲授哲学史;1960—1964年则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从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德勒兹也开启了他的早期哲学写作。1953年,德勒兹第一本讨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专著《经验主义与主体性》(*Empiricism and Subjectivity*)出版。1953年之后的八年时间,德勒兹除了几篇文章,并无其他成果出版,他本人曾以“一个长达八年的洞”来形容这一段时期。1962年,德勒兹的第二本专著《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的出版打破了他长期的沉默,这本书不仅使尼采的思想进一步在法兰西学院中传播,也使德勒兹本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事实上,德勒兹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启了哲学史研究¹。同年,德勒兹在朱尔·维耶曼(Jules Vuillemin)家中结识了在克莱蒙费大学任教的福柯,由此开启了两人的长期友谊。1964—1969年,德勒兹在里昂大学任教,并逐步成为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哲学阐释者之一。

其三,研究哲学。1968年德勒兹完成了博士论文《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论文的副标题为“哲学中的表现主义:斯宾诺莎”(“Expressionism in Philosophy: Spinoza”)。在指导老师莫里斯·德·冈迪亚克(Maurice de Gandillac)教授与费迪南德·阿尔基耶(Ferdinand Alquié)教授的指导下,德勒兹不仅完成了个人对哲学史研究的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原创价值的“差异”哲学概念。同

1 主要研究对象为康德、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斯宾诺莎、休谟、拉康、普鲁斯特等人的哲学思想。

年，德勒兹结识精神分析学家瓜塔利，两人逐渐成为哲学思想研究的合作者。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卡夫卡：走向小文学》等诸多哲学研究著作，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与价值，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如果将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研究视为求学阶段的学术成果，那么《差异与重复》一作的问世则标志着德勒兹第一次产出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成果。这些相互关联的学术著作(包括他自己的独著和与瓜塔利合著的作品)标志着德勒兹从早期哲学文本研究阶段进入哲学概念产出阶段(Patton: xi)。之后，德勒兹因与学生们在里昂参与政治运动而过度劳累，导致身体情况急转直下，并患上了严重肺疾。1969—1987年，德勒兹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万塞讷大学)任教。1991年，德勒兹与瓜塔利出版《什么是哲学?》，该作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德勒兹思想的书籍，较好地印证了福柯的著名论断——“20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福柯本人曾为《反俄狄浦斯》一书作序，并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德勒兹思想的哲学价值，且大胆提出20世纪将是德勒兹的世纪)。1992年，德勒兹好友瓜塔利因心脏疾病去世，而德勒兹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急剧下降，饱受肺病折磨。1995年11月4日，德勒兹因不堪肺病的折磨，从巴黎住处的窗户跳楼自杀，结束了生命，享年70岁。

“什么是哲学?”是德勒兹在早年便开始思考的问题，同时他也试图对此进行回答。德勒兹逝世之后，马丁·汤姆·迪克(Martin Tom Dieck)和延斯·巴尔泽尔(Jens Balzer)曾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过一册妙趣横生的连环画《嗨，德勒兹!》(*Sault, Deleuze!*)¹，在画中哲学家德勒兹被摆渡人往返摆渡于生死两岸之间。在死亡之岸，他热情地问候自己的哲学导师与朋友们，如福

1 《嗨，德勒兹!》是迪克受到20世纪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意外死亡(譬如，德勒兹以自杀结束自己的人生，巴特因车祸而离世)的触动而构思的作品。他邀请巴尔泽尔为漫画进行剧本的创作与对话的设计，通过创作“行船上岸”的重复情节，对生与死的距离进行扭曲，以此致敬后结构主义哲学家。

柯、拉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然而,还没等到他们成功会合,摆渡人却调转航向,将德勒兹送回起点。如此循环,不断上演。这册先后在德国与比利时问世的连环画,以独特的方式呼应了德勒兹对重复与差异的思考,为我们一窥德勒兹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一个切口。

其一,德勒兹的哲学思考继承了拉康、尼采、斯宾诺莎等哲学家的思想。以斯宾诺莎为例,斯宾诺莎认为“欲望”是主导身体产生“行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他将“情感”(emotion)归类于身体的“改变”(modification),从而影响身体活动的力量(增强或减弱)与流畅性(顺畅或阻碍)(斯宾诺莎:98)。不同于柏拉图与拉康的欲望需求理论——他们简单地认为人的欲望来自对现实情况的不满(换言之,因为缺乏什么,欲望便驱使身体去获取),斯宾诺莎将欲望归结于生成于本心的主动情感,帮助摆脱外部条件的束缚,完成逃逸。德勒兹继承了斯宾诺莎的哲学思考,进一步提出了无器官身体的观念,既然身体尚未分化出相应的功能区(器官),那么欲望便被允许在身体各部位中肆意流淌(德勒兹、瓜塔利¹,2010:206)。至于尼采,德勒兹认为“权力意志”是决定人们思想认识和道德价值的根本要素,这种非理性的生命能量像是不断冲撞的河流,代表着一种生成、流变的状态。同时,权力意志是多元的,它们相互联系,彼此转换,不能独立于现象之外。德勒兹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中发展出“欲望机器”的概念,欲望是一台不断与现实相联系的机器,这种性质的欲望没有主体,没有指向,不断生成,不断流动。由此,“永恒回归”的是差异性的、多元化的世界,而“精神分裂”则成为“欲望机器”的最佳表征(德勒兹,2016:64)。

其二,彼时法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为德勒兹的哲学探索提供了肥沃土壤。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与现象学走向式微。人们发现盲目信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将社会的稳定秩序寄托于遏制力比多的宣泄,不加选

1 该引用文献又译为加塔利。

择地将力比多理解成社会文明的破坏力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国出现了以心理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法国第一位质疑欲望与社会领域互动机制的思想先驱）为代表的“离经叛道者”，他们率先指出通过遏制力比多来稳定社会秩序的逻辑局限，并借此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机制（Deleuze & Guattari, 1983: 118）。这对德勒兹创设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欲望生成模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政治层面，战后法国形成的“戴高乐主义”¹逐渐走向体制僵化与机构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劳资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甚至趋向崩溃的状态。因此，如何建立新的劳资体制，如何建立新的资本积累结构，如何进行劳动生产关系改革，如何缓和激化的斗争，都成为摆在哲学家面前的思考难题。

其三，德勒兹挑战并超越了前人既有的哲学思想。他不仅继承，而且挑战这些在哲学界拥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家，例如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等。他在1968年的《差异与重复》中提到尼采，生成了自己的“差异”美学概念；在1972年的《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将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无机体器官”的概念引入身体美学（有机体）中，无器官的实质在于生成无所指的欲望，而身体作为欲望机器将永恒运作。在德勒兹看来，无须过于厌恶或者盲目崇拜已有的哲学思想，哲学家的任务在于生成新的哲学概念。尽管碍于转换、滑脱、断裂、潜藏和逸散等影响因子，这些新生的哲学概念通常是“畸形的”，却具有强烈的“解辖域化”特质。60年代末，德勒兹与瓜塔利的相遇堪称其整个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德勒兹高度赞扬瓜塔利的“反对精神”，甚至将其称为“独

1 “戴高乐主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对于法国采取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本质上即为法兰西民族主义，核心精髓在于在国际上谋求法国的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在国内政策则偏向社会保守主义、凯恩斯主义与民粹主义。该政策帮助法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创造了“光荣三十年”（1945—1975年）的辉煌，发展经济的同时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法国经济走出“戴高乐主义”的余晖，走向萎靡。

创性哲学的化身”（Deleuze, 1995: 5-6）。两人先后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卡夫卡：走向小文学》《什么是哲学？》等作品，逐步丰富解辖域化概念，使之成为体系化的哲学理论。

此外，解辖域化概念的形成亦源于瓜塔利个人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不可否认的是，德勒兹与瓜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系列书籍中的哲学成就，是瓜塔利最为人熟知的学术成果（Genosko: 1）。然而，瓜塔利本人的主要研究成果——一种实验主义的精神分析，国内学界却甚少关注¹。因此，我们应如何理解该成果对解辖域化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

首先，瓜塔利的学术成长路径何如？他的毕生学术经历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1) 青年社会实践阶段。1930年，瓜塔利出生于巴黎西北部近郊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40—1950年，瓜塔利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研习药学与哲学，并结识了未来研究精神分析的合作伙伴费尔南·奥利（Fernand Oury）。1953年，拉康研究者让·奥利（Jean Oury，费尔南之弟）成为瓜塔利的实习导师，让其参与了拉伯德精神病治疗中心（La Borde）的建设，为其将来走上精神分析研究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2) 精神分析学习阶段。1960—1970年，瓜塔利致力于机制性精神治疗协会（SPI）以及机制性研究与群体研究联盟（FGERI）的建设工作。前者由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组成，专事研究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后者由跨学科的多位学者专家组成，专门研究种种社会压迫现象。这一行为标志着瓜塔利正式进入精神分析领域。1962年，瓜塔利师从拉康，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精神分析学习。1968年，受到法国“五月风暴”的影响，瓜塔利

1 根据CNKI数据库，以“瓜塔利”“瓜塔里”“伽塔里”“伽塔利”“迦塔里”“迦塔利”等对于瓜塔利的常见中译称谓的词条进行搜索，结果显示，共计59篇文章中，仅4篇探讨了瓜塔利个人的理论研究，而非他与德勒兹的合作研究。

的精神分析研究视野拓展至全球与国际问题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及酷儿理论。1969年，瓜塔利正式加入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并结识了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的德勒兹。

3) 精神分析研究阶段。从1970年到1992年瓜塔利去世，他一直进行三项工作，均与精神分析领域相关。其一，独著以及与德勒兹合著精神分析理论书籍。1972年，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出版。同年，《精神分析与横向沟通》出版，德勒兹为该书的第二版作序。1975年，与德勒兹合著的《卡夫卡：走向小文学》出版。1980年，与德勒兹合著的《千高原》出版。1986年，独著《冬季的年月：1980—1985》(*Les années d'hiver 1980—1985*)。1987年，与德勒兹共同创立《空想》(*Chimère*) 学术期刊。1989年，独著《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Cartographies schizoanalytiques*)。1990年，与德勒兹合著《什么是哲学？》，于1991年出版。1992年，独著的《混沌互渗》(*Chaosmose*) 出版。其二，进行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在拉伯德中心建成之后，瓜塔利一直在其中担任医生并进行诊疗，直至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此外，他还积极参与精神分析研究的影响力建设。1975年，瓜塔利协助建立国际替代精神病学协会(*Réseau International l'Alternative de la Psychiatrie*)，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该协会汇聚了一批精神病学家、护士与精神病患者，致力于彻底改变精神疾病的诊疗方式。其三，将精神分析研究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基于先前在FGERI对社会压迫现象的研究经历，瓜塔利于1970年同法国和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者”团体建立联系，并积极出版相关作品。1977年，独著的《分子革命》(*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 出版。1979年，为支持自治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瓜塔利出版了《机械无意识：精神分裂分析论文集》(*L'inconscient machinique: Essais de schizo-analyse*)。1989年，独著《三重生态学》(*Les trois écologies*)。晚年的瓜塔利致力于融合生态学与社会运动，及至1992年临终前，他仍在支持以生态保护为主要施政纲领的法国党派(Guattari, 2000: ix-xv)。

总之，除师从拉康的系统学习以及与德勒兹的合作外，瓜塔利的学术历程始终与精神分析以及诊疗实践紧密联系。正是通过不断将自创与所学理论付诸实践检验，他才最终取得了实验主义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

其次，如何理解瓜塔利精神分析的实验主义特征？

瓜塔利提倡解构医患关系，以平等对话重构精神病诊疗方式。瓜塔利死后的一段悼词对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菲利克斯当晚去世。

他始终认为，会说话的病人和最孤僻、最谵妄的群体之间可以进行对话。他说，不是任何群体，而是那些“可以超越人类局限的最完美形象的群体。我自己的每一项事业都发现自己被抛弃在一个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不可抗拒的实例的名义下，那就是它被别人的存在所捕获……”。

第二天，当奥利告诉他们菲利克斯的死时，病人们在休息室里哭泣。

“感谢你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回应。为了悼念他，即使许多人在那天晚上踱步，无法入睡，他们也是有礼貌的、温柔的、没有声音的。夜晚是平静的。（转引自 Genosko: 1-2）

这段悼词为读者提供了两种信息：从医者的角度，瓜塔利渴望成为“最孤僻、最谵妄的群体”的一员，与病人建立有效的对话；从患者的角度，瓜塔利在拉伯德中心的长期诊治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本人真正做到了与患者打破身份边界，采用平视的诊疗方式。

瓜塔利的精神分析不仅超越了传统的个体治疗模式，更倡导一种跨越传统心理学与社会学边界的实验性方法。这一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治疗视角的去中心化。与拉康的经典精神分析不同，瓜塔利主张以一种“横向性”（transversality）的全新模式来进行精神分析，旨在打破个体与社会

结构之间的界限。他将病人的情感和心理问题视为社会结构压迫的产物，进而提出了“分子革命”这一概念，即精神病理学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更是与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不仅要面对自身的无意识冲突，还要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刻的对话。通过这种方法，瓜塔利致力于实现个体精神分裂的解放，从而突破传统医学治疗中的僵化界限，打破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偏见与歧视，最终建立一种更灵活开放的诊治模式。这种理论的实验性体现了瓜塔利对精神分析方法的创新和拓展，打破了医学与政治、心理与社会之间的传统边界。

最后，瓜塔利的精神分析成果如何催发“解辖域化”概念的形成？

瓜塔利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也为解辖域化这一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德勒兹和瓜塔利对精神分裂症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后来成为他们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要理解瓜塔利的精神分析成果如何催生解辖域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理论路径：解构传统精神分析界限。瓜塔利的精神分析理论旨在突破传统结构主义对个体力比多社会传递机制的分析框架，倡导一种开放灵活的新范式。他通过解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强调“无意识”不仅仅是个人内心和家庭的运作结果，更是与外部世界相互渗透的流动性过程。正如他在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对拉康结构化的精神分析观点提出的质疑：

如果家庭问题经常爆发出精神病这种意识的话，我们会更加惊讶——这与拉康的一句话一致——如果俄狄浦斯是在精神病中“发现”的，那它实际上早已在个人和家庭中潜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关于精神病，家庭情结恰恰作为一种刺激出现，它的性质僵化，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催动因素，并非是决定因素。能够决定精神病症爆

发的因素，则是承载着完全不同于家庭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多方面荟萃的现实世界。（Deleuze & Guattari, 1983: 123）

通过这一理论路径，瓜塔利让精神分析不再局限于治疗个体的心理问题，而是拓展至对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分析，进而为解辖域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固守传统社会秩序与身份结构的“界域”中解放出来，进入一种更加流动和开放的状态。

社会参与：解放个体与社会结构的束缚。瓜塔利的精神分析不仅在学术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论也贯穿于他的社会活动中。FGERI的成立表明，瓜塔利始终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社会压迫、阶级对立和文化暴力都是导致个体精神创伤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精神分裂症不仅是个体心理的失调，更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和阶级压迫的体现。瓜塔利通过倡导精神分析的“分子革命”与“解辖域化”，力求从社会结构中解放个体，使他们摆脱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以及阶级关系的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瓜塔利抛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转而支持意大利自治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只看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而忽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体性；反对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资本塑造世界的逻辑，而忽略工人阶级自主地位。虽然其存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龃龉，但是其价值在于，对马克思的解读不是一种书斋式的，而是一种实验式的（陈培永：66）。可以看出，瓜塔利不仅持续致力于社会压迫与解放的研究，而且在结合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时，始终保持着开放、有活力、实践性的态度，而非僵化死板。可以说，瓜塔利对现实社会的发声与他开放的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密不可分，二者共同推动了解辖域化这一概念的形成。

精神病诊治实践：走向横向性与无界限的治疗。在精神病诊治实践方面，瓜塔利提出的“横向沟通”治疗方法也是解构传统治疗界限的重要一

步。他强调精神病诊疗的核心不是治疗个体的病症，而是让个体能够重新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

(精神病患者)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完全不可预见的表达能力——例如，具有绘画性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他们从未被允许察觉到这一点。办公室员工更喜欢承担物质任务，农民则致力于管理病人俱乐部，两者都比单纯的娱乐更多地从中获益：他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与世界的关系。

而这是最重要的，这种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对应着人格成分的重新调整。世界和“他者”不再以同样的声音对他说话，或以令人不安的坚持取代了令人放心的中立。但请不要误解：这种与精神病对话的他异性世界，并不是一种想象的、疯狂的或幻想的秩序，它还表现在日常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现实中。在想象的一面，心理治疗可以通过“投射平衡”的方式进行干预，以恢复身体，修补自我的创伤，锻造新的存在领地。在现实方面，可以预期的是主体间性场域和语用语境能够带来新的回应。(Guattari, 2009: 180-181)

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与病人不再是传统的医患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对话关系，治疗过程变成了一个共同探讨、共同构建的过程。通过这一治疗实践，瓜塔利进一步推动解辖域化的实践，呼吁人们从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固有界域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更加开放的、流动的存在状态。

通过瓜塔利的学术和实践努力，特别是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实验性探索，他为解辖域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解构传统界限，挑战精神分析、政治和文化中的固定结构，揭示了个体与社会、历史与文化之间的流动关系，从而推动了这一概念的深刻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解辖域化的核心思想最终成形：个体与社会、身份与情感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被重构和解放，并在不同的“界域”之间实现流动。

1.2 解辖域化界说

1.2.1 解辖域化三阶段：“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千高原》一书中提出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差异哲学、流变思维和游牧思想，提炼出“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这一重要的哲学概念。

首先，辖域化源于拉康的过程分析理论。从狭义角度看，母亲哺乳的行为包含母性的权力运转与营养的输送过程，这种印记划定孩子的口欲区，即嘴唇与乳房之间产生力比多的关联。因此辖域化指向欲望在被限定的身体器官中生成的过程。从广义角度看，辖域化指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编码的过程，从而使地域之间建立起清晰的边界线。同时这种编码与分解的现象也辐射到地理学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例如自然科学、人文社科、语言与文化、政治等。给事物编码的行为可以创造出内涵丰富、特征明显的节段性（segmentation）。

其次，解辖域化是对社会和国家边界与节段的解码。作为拉康的弟子，瓜塔利在辖域化的精神学概念上提出了解辖域化这一概念。1968年，他在《群体与个人》（“The Group and the Person”）一文中使用“辖域化的幻想”来解释群体的个人崇拜现象（转引自周雪松，2018：82），借以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面目，他首次将de-这一前缀添加到辖域化之前，否定社会对于欲望的编码与圈定。约瑟夫·柴尔德斯（Joseph W. Childers）和加里·亨齐（Gary Hentzi）主编的《哥伦比亚辞书：现代文学和文化批评》（*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